

清华人文修养丛书

丁夏著

咫尺千里

明清小说导读

清华大学出版社

<http://www.tup.tsinghua.edu.cn>

(京)新登字 158 号

内 容 提 要

本书选取了明清时期 10 部有代表性的小说名著,结合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脉络,对这 10 部小说的创作与成书、作品的思想倾向与审美追求、小说人物形象与语言风格进行了深入细腻、时有新意的分析,同时以明清两朝的文化演进转变为背景,力求揭示小说所反映出来的当时蓬勃壮大的俗文化的特质内涵,以使读者可由深入了解“小说中国”进而窥见“文化中国”。书中博采众家之长,对明清以来的传统小说评点、本世纪国人的小说研究考证,以及海外学人的小说批评多有所涉猎,并加以辨析。

本书是引导在校大学生研读中国古典小说的入门佳作,也适合一般文学爱好者阅读参考。

书 名: 咫尺千里——明清小说导读

作 者: 丁 夏

出版者: 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清华大学学研楼,邮编 100084)

<http://www.tup.tsinghua.edu.cn>

印刷者: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

发行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字数:** 299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2-00991-0/I·27

印 数: 0001~3000

定 价: 19.50 元

前 言

一

在旧文学的传统里浸淫已久的人大概绝大多数都会赞同下面的判断，那就是：“中国文学的好处在诗，不在小说。”^[1]这句话文雅而又简要地凸现了中国文学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小说算不上正式文学作品，也不是最好的文学作品。即使是20世纪后半段出生的人，也会受到这种观念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笔者上小学的时间是60年代，上距大力推崇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成就的“五四运动”已经接近半个世纪，但我在小学的课本里，从来没有接触过古代小说。古典文学给我的印象是有数的几首唐诗，后来又慢慢增加了宋诗、宋词、元曲和汉魏六朝乐府。所以我想，古代小说只能算是通俗的课外读物，而不能加入古典文学精华之列。直到70年代末笔者上了大学，才第一次对“五四运动”有了比较真切的了解，也才第一次知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小说界革命”曾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揭开了新文学的序幕，而“小说界革命”的结果并不是全盘否定旧小说，而是在整个旧文学里给予了旧小说——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上历来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消遣读物——一个崭新的评价：小说也是一种正式的文学样式，完全可以和诗、词、曲、赋并立，旧小说中的几部杰作更可以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蒲松龄、吴敬梓和曹雪芹，完全可以和屈原、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人并列。

现在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本世纪中国社会的影响，大概是既不能低估也不应高估。旧小说至今尚不能和唐诗宋词在中小学

教材里同分一杯羹,即是一个小小的例证。自然,也并不是说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东西就是天经地义,今人理当贯彻执行。新文化运动先驱者当时的许多言论现在看来其实都不免显得激进甚至幼稚,可是他们当年热情洋溢地推崇通俗文学,对旧小说中的杰作赞赏有加,这实在是一种现代眼光和现代气派——到了他们眼里,文学殿堂再也不是昔日的三六九等,各种文体第一次没有了历来的高下尊卑之别,而是“众生平等,法无高下”。这样一种平等的文学观念,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而又一直维持着严格的文化等级秩序的国度里,可以说具有某种石破天惊的意义。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上的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把过去一向被文人雅士所轻视的传统小说也列为古典,承认通俗文学也是中国文学传统里不可忽略的成就。有了这样的文学观念,尽管相当部分的人还是会认定唐诗宋词的文化品格高于小说,然而传统小说终于有了自己的堂堂正正的地位,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

有意思的是,尽管传统小说的地位历来比不上诗词散文,可是在中国社会里,一个受过初级以上教育的人,大概不会不知道《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红楼梦》;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中间,这几部小说的普及率更可以肯定地说是超过了屈原、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的诗篇。在普通的中国人的历史观、伦理观、人生观、社会观里面,笔者也相信可以随处轻易地发现传统小说的影响,而且其影响未必就比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要小。举一个例子,《三国志演义》第一回开篇有一首词,这首词在词家看来大概没有资格入选任何一本词选,但在词中所隐藏的历史观——那是一种对世事的悲凉感触与历史循环论的自然而然的混合物——在普通中国人心中所刻下的痕迹,未必会比任何一本著名的史书小。至今仍在俗语中活跃的熟语,像“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都可以和这首词的基调相印证,或者说,它们其实就是同一个观念的不同表达而已。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

传统小说在中国文化里可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部分：它缺少官方的正式地位，但并不缺少普遍而深入的社会影响；它很少被正式纳入教育体系，可是自有其民间的有效传播渠道；它虽然被看成是一种消遣性的东西，然而它在中国文化里发挥的作用远不是寻常的消遣性读物可以比拟的^[2]。

这也就是说，即使不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传统小说也是中国文化里的活跃因素，在中国普通大众包括读书人中间一向有着很高的普及率和很深的影响。研究中国传统文学甚至是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如何，小说是一个不能轻视、忽略的品种。

二

一个接触过西方文学的人回过头来看中国文学，又会发现中、西方的文学批评存在着很大差异：中国的文学批评虽然相当发达，但却不像西方的文学批评那样体系严密、架构清晰、论述明确；中国文学批评的好处在于生动、形象、富于暗示性和哲理，缺点则是散漫、随意、逻辑不够严密。明清以来的小说批评——传统的术语叫“评点”，尤其能够反映中国文学批评的长项与短处。出于消遣而阅读传统小说的人可以不理睬历来的小说评点，研究者则不能对这些评点置若罔闻。笔者相信，明清小说评点确实不乏精彩之处，不过其优点也就集中体现在精彩的片言只语上。从整个的批评框架来看，这些评点与现代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距离甚远。评点家的某些见解可能确有启发性，可是你千万不能按照评点家的指点、顺着他们的视野去研读传统小说，那样很可能会步入歧途，最终让你觉得小说不过是文章——好的小说被评点家说成是好文章，不好的小说自然也就是不好的文章——评点家最喜欢炫耀所谓“章法”、“句法”，动辄就称某字用得如何巧妙，某句写得如何高明，这类评点虽有微观上的道理，却缺乏宏观上的价值。一个人在读小说

的时候并不能等同于读文章,好的小说与不好的小说其实多半都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比以抒情言志为主的诗歌更接近人类生活,更能反映社会生活的全貌。解读小说更重要的任务是从小说的人物、故事里去领略作品的思想情趣、作品所反映的社会习俗风尚,以及作品艺术表现的特色与成就。简言之,解读小说实际上也就是解读人生。

认定小说最贴近人生本身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新的观念。当代人研究传统小说,不可能离开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应该承认,五四以来对传统小说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鲁迅、胡适等人的贡献尤为突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国人里面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演变的学术专著,尽管此书完成于20年代,距今已有七八十年的时间,书中的某些具体论述现在看来已不够完善,甚而不无失误之处,但其历史贡献是有目共睹、不可抹煞的。在鲁迅之前,小说批评已经有了数百年的历史,有些小说批评,像毛宗岗的《三国志演义》评点、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脂砚斋的《红楼梦》评点,就都相当流行并有广泛的影响。不过,相比较而言,这些评点都是针对某一本具体的小说而来的,和中国诗文批评一样,这些评点大多具有随感而发的性质,既缺少理论的系统性,又不属于严格的学术研究。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诞生以后,中国才真正有了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学术研究——鲁迅的这部著作翻开了中国小说研究的全新的一页,给小说研究带来了一种历史的眼光和审美批评的视野,呈现在研究者面前的不再是孤零零的一部部具体作品,而是中国传统小说从发轫到成熟、衰落的完整过程,以及小说与社会、与文化其他领域的内在联系。在鲁迅以后,传统小说也变成了我们和中国历史、文化联系的一条牢牢的纽带。我们会从小说里读到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背景。20世纪的中国小说研究也从鲁迅开始与国际接轨,变成了一门真正的学术。时至今日,《中国小说史略》仍是不满足于只读小说而同时也希望对

小说历史背景有更多的了解的人很有参考价值的一本书,对小说研究者来说,它更是一本足以受惠良多的必备书。

胡适没有写过类似于《中国小说史略》那样的专著。但他有关《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醒世姻缘传》、《儒林外史》等十数种小说的论文与序跋,却对当时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产生了极大的震荡,并在本世纪留下了深远的影响。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胡氏当时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使然,而且是因为他的研究在方法论和治学观念上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胡氏对小说版本、作者家世生平、作品与社会背景的关联等方面的考证,开辟了现代小说研究的新领域,也体现了现代学者学术研究的功绩。毛泽东同志就曾经对胡适的“新红学”研究加以充分的肯定。相比较而言,胡适的小说研究虽然不像鲁迅那样眼光宏通深邃,但从小说研究的方法论的角度,可以说他的贡献应该不在鲁迅之下。胡适晚年曾总结自己的小说研究工作:

我在《红楼梦》考证文笔的结论上说,我的工作就是用现代的历史考证法,来处理这一部伟大小说。我同时也指出这个“考证法”并非舶来品。它原是传统学者所习用的,这边叫做“考证学的方法”。这一方法实际上包括诸步骤:避免先入为主的成见,寻找证据,尊重证据,让证据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自然的、合乎逻辑的结论。^[3]

胡适的“历史考证法”影响了大半个世纪古代小说研究的方向,小说研究的学术成果,在近几十年里面,也以考证方面最为突出。胡适的一些具体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影响亦十分深远,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曾预言:“《红楼梦》……作者之姓名与其著述之年月,故当为惟一考证之题目。”不到20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问世,小说作者为曹雪芹遂成为定论,不仅“红学”中由此生出了“新红学”,

20世纪中国小说研究里还由此诞生了一个日后久盛不衰的新分支——“曹学”^[4]。

以鲁迅、胡适的研究作为先导,20世纪传统小说研究可谓成就斐然。无论是对小说作者、小说版本、作品思想、作品艺术成就的研究,还是对小说与社会思潮的联系、小说所涉及到的中外文化联系等的研究,20世纪的研究成绩都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例如,在《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家世生平、《红楼梦》的版本研究等方面,周汝昌、冯其庸、吴恩裕、吴世昌、王利器诸先生所发掘的成果,就远远超越了当年的胡适,使得今人对《红楼梦》的了解有了一个切实并相当清晰的背景;王昆仑、李辰冬、吴组缃诸先生对《红楼梦》小说思想和艺术成就的研究论文专著,也标志着20世纪人们对这部杰作的认识达到新的深度。在《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及明清其他小说的研究方面,陈寅恪、孙楷第、阿英、吴晗、郑振铎、赵景深、徐朔方、路大荒诸先生的贡献,也显然是各具慧眼、多有创获。事实上,在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中,古代小说研究即使不是成就最为卓著的,也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到目前为止,还很少看到有哪种传统文体的研究能够像古代小说研究这样,吸引相当数量的海外学者并在研究中做出显著的成绩。

不过,也应该承认20世纪的古小说研究走过曲折的道路。这在近半个世纪以来表现得尤其分明。平心而论,近半个世纪的古典小说研究有两个鲜明的缺陷:一是学术性的研究有一部分似乎过于细微,纠缠于一些无关宏旨的枝节问题;二是小说思想内容的阐释有时和研究与当时时事政治的关系过于紧密。前者虽然不乏精细缜密之作,研究者兴味盎然,但实际上却常常偏离了小说研究的轨道,对“知人识书”没有明显的意义。相形之下,50年代以前有些学者在研究中却能体现精深与博大的完美结合,例如陈寅恪先生有关《西游记》研究的论文^[5],就在“考其源流”、“究其流别”的总方向下,把“孙行者大闹天宫故事之起原”、“猪八戒高家庄招亲故

事之起原”与“流沙河沙和尚故事之起原”加以深入的考证，其结论未必即是定论，却极富启发意义——原来在中国古代小说里面，实际上深深地渗透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在20世纪中国已经融入世界文明进程的总体背景下，这样的文章实在是表现了本世纪中国人应该具有的世界眼光。50年代以来，我们很少看到小说研究论文能够达到陈先生论文的水准，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至于后一方面的问題，看来责任主要不在小说研究者，而是一时的风气造成的后果。经历过70年代轰轰烈烈的《水浒传》评论运动的人都记得，当时的《水浒传》研究已经与小说研究距离十万八千里，是在用政治斗争的术语解释一部数百年前的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当时政治人物的替身。从当时上推不到20年，在50年代，《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曾经被颂扬为“农民起义英雄代表”，姑且不论这顶现代尺寸的高帽对梁山好汉是否合适，至少在小说里，他们是性格各异而又彼此意气相投、患难与共的。殊不料20年之后，竟有人断言他们中间的领袖本人就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其言行举止又被说成与20世纪70年代中国某些政治人物遥相呼应、配合默契。这样的研究，当然是极端的例子，不过它的出现并非偶然，而且极端的東西往往最能反映某种现象的本质。

笔者的建议是：古典小说和有关的研究文章最好合看——当然前提是有一定的时间。好的研究文章不仅能帮助加深对作品的理解，而且它本身就很有价值，不少潜伏在小说里的问题一般读者难以看出，不少与小说有关而涉及到当时社会文化的复杂问题更非一般读者所能了解，那么，何不看看有价值的研究文章呢？一言以蔽之，如果时间允许，何乐而不为？

三

本书的撰写工作延续了数年。当然，延续数年并不表示“慢功

出细活儿”，而只是因为没有做到“一气呵成”。延宕的原因主要是初稿完成后，毫无“文章是自己的好”的感觉，总想把它修改得像样一些，于是不断在改。改到现在，仍然不能说是满意，但显然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事先已经与出版社签了合同。唐人有两句诗：“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种战战兢兢地缺乏自信，恰是笔者交稿时的心情写照。但是，既入了洞房，也就丧失了原先的自由身，既签了合同，也就得交稿。原来打算进一步修改的一些想法，有的已经写进了书中的有关章节里，有的自觉还未能体现出来，干脆借这个机会，一并在下面做几点说明。

（一）中国小说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一种具有宽泛的包容性的边缘文学。所谓边缘文学，是指小说与诗、词、曲、赋等不同，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的清晰、稳定的文体特征，无论是作品的内容，还是作品的形式，都缺少一个明确的规范。小说可以记事，可以记言，可以抒情，可以写景，也可以等同于笑谈、随笔、小品；可以郑重如史书，也可以萧散如杂记；可以骈文为之，也可以白话为之；可以在其中发议论，也可以在其中穿插诗词名句，等等。中国小说的这些特点，在其传统的文言小说里反映得最为明显。不要说魏晋时期的笔记小说，就是被现代学者认为是成熟小说范式的唐传奇小说，其实也是一种不确定、不稳定的文体，是若干篇成熟的小说与数量更多的笔记杂著的混合物。由少量作品体现的创作成就并不表示文言小说在唐代就已经达到了成熟，相反，文言小说从整体上看，不光在唐代没有成熟，就是到了清朝中叶，也还没有完全达到我们现在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小说的规格——即使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还只有部分是成熟的小说，或者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同时又有相当多的作品属于笔记杂著的后裔。不是唐传奇的作者或蒲松龄没有才气，而是中国小说本身就是一种多种著述的集合体，是一种边缘文学。成熟的小说在这种集合体中慢慢地孕育出来，后来长出若干参天大树，结出若干壮硕的果实，但在大树果实之下，

更普遍的则是始终没有长大的嫩芽小草。如果小说的定义可以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那大概是虚构的叙事文学。能够满足这一条件的中国古代小说的确数量不是太多。所以称赞中国小说成就的人往往会在赞誉的后面赶紧补上一句话,说明佳作其实有限,若干流行甚广的小说已经足以代表中国小说的精华——犹如所谓“梁山好汉,全数在此”的壮语,实际到场的仅是李逵、武松、林冲等几位,而无需一百单八将全体亮相^[6]。

(二) 边缘文学的性质既是中国小说的先天缺陷,也是中国小说在另一个角度来看的先天优势,这就是中国小说反映的中国文化的深度与广度。用现代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标准来衡量,传统的中国小说很多都得落选;可是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这一特点决定了传统中国小说里包含了许多现代小说中没有写或不应写、不能写的东西。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化中,小说真是四面接邻——与历史、与宗教、与哲学、与伦理、与政治、与制度、与民俗、与艺术,等等。有人曾说:“《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似的小说杰作”,事实上《红楼梦》不可能包罗万象,但如果说中国传统小说在整体上是一部有关中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那应该是与事实相去不远。据说“词的世界仿佛较小”,而“旧诗”则堪称深广,虽然旧诗里“不过是些世俗的悲欢离合”^[7],在描写古人情感世界的波澜曲折方面会胜过小说,但在表现社会生活的全貌和实况上,旧诗也肯定不及旧小说的深广。譬如,要理解旧时文人的世俗理想,唐传奇《枕中记》就是一篇浓缩后的简写本——小说主人公出将入相,娶贵妻得大富,门第显赫,子孙发达,历尽人间的荣华富贵——可惜只是“黄粱一梦”,是理想的幻觉而非现实。不过《枕中记》的幻觉包含了几乎是旧时文人的全部人生目标,所以此篇既出,就成为旧诗中最习见的典故,历来许多诗人都喜欢把自己的失意感与小说中的人生幻觉联系起来,以自慰自遣。再譬如,明清通俗小说里有关佛教的描写也很值得玩味,僧人在通俗小说里主要扮演两种角色:预言家与色中

恶鬼。大概不能说这就是历来僧人最常见的社会角色，它所反映的其实是民间俗众对外来佛教的两种最基本的态度：既敬畏又抗拒。佛教理论的严密精致，以及它对人生现实和来世的全面解释，很自然地使民间俗众感到敬畏，预知前生后世的预言僧人实为敬畏之心的形象造型；佛教的“清心寡欲”观与中国传统的人性论、家庭观念有着本质上的冲突，文人中流行的所谓“居士”的做法，是对佛教与中国传统的冲突做了一个温和实用的折衷，但是民间俗众对佛教的抗拒显然要直截了当得多，小说里的和尚是色中恶鬼，就表现了民间俗众对佛教教义的根本怀疑——正常的人怎么可能没有“人之大欲”？又怎么可以不尽“孝道”？“人之大欲”既是人的本性，刻意压抑它也就只能有一种结果，那就是变态的疯狂，即所谓色中恶鬼。外来的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冲突融合是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大题目，明清通俗小说中有关僧人的角色故事的描写是这一冲突融合在民间俗众心里激起的波澜。中国历史文化、中国社会演进在小说中的沉淀极为深厚，陈寅恪先生就曾说：“唐代小说之所取材，实包含大量神鬼故事与夫人世所罕见之异闻”^[8]，这类“故事”与“异闻”，以现代小说的取材标准来看，似乎都不合标准规范，然而其中所包含的极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正是中国小说特有的一种价值。

（三）中国小说有两种基本形式，即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把两者统称为古代小说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而以学术的分类严格地说，它们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文体，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运用的是不同的语言，表现了不同的情趣追求。当然，也并不是说两者之间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白话小说的发展过程里，就可以看出文言小说深刻的影响。不过一般的读者和大部分的学者，主要是从语言上区分两种小说，而没有意识到它们是中国小说里的两种文体、两条源流。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是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王氏曾指出，文言小说“但为著述上之事，与宋之小说无与焉。

宋之小说,则不以著述为事,而以讲演为事”^[9],说“宋之小说”与文言小说“无与焉”似过于斩绝,但文言与白话小说的确各成系统、相对独立。概括言之,文言小说始终依附于史书著述,受史官文化传统的影响极深,以在正史之外拾遗补缺为己任,以“述轶事”、“记异闻”为根本,虽刻意不标榜“事纪其实”、“言必可信”,但并不强调虚构;白话小说则以民间文化为依托,虽然也受到史官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其所写内容则大部分出自民间想象,人物、故事也主要出自虚构。虚构成分的多寡,是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之间的一个内在的很深刻的区别。解读、阐释白话小说,虚构性是关键所在。研究者的主要任务,是揭示白话小说虚构背后所反映的民间心理、社会思想。本书在第二章《三国志演义》中,比较集中地阐释了这部小说的虚构成分,说明虚构既是这部号称“据实指陈”、“庶几乎史”的小说的基本内容,也是这部历史演义小说成功的艺术上的要素。即使是被胡适强调为“曹雪芹自叙传”的《红楼梦》,现在看来,显然也是一部虚构大于写实的小说。胡适当年以提倡富于现代科学精神的“考证”来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对正确理解《红楼梦》的主旨内容起了拨云雾见青天的作用,在现代科学方法面前,“旧红学”迅即溃不成军。但“新红学”一开始也包含了一个缺陷,那就是过分强调曹家的家世在《红楼梦》中所占的比重,甚而把小说等同于自传。这实际上是胡适自己也还没有完全摆脱中国传统史官文化阴影笼罩的表现——胡适的《红楼梦》研究受“脂砚斋”影响极深,“脂砚斋”的批语中则屡屡申明“真有是事”、“真有是语”、“实在有的”、“亦是真话”、“有是人”^[10],胡适也认定《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小说”。其实,即便是“真有是事”、“真有是语”,也不能断言整个小说就是曹家的自传,从胡适以来的有关曹雪芹家世生平的考证已经充分证明,小说里面的“贾府”地位声势远比现实中的曹家要显赫得多,小说里的“大观园”壮丽精致,也决非现实中的曹家故园或当时京师王侯豪门的园林所能比拟,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是别的造成

的,正是小说的虚构结果。在《石头记》的批语中,脂砚斋还有一句话重复过两次,胡适似乎没有特别重视——也许是只对其中的后半句心领神会——脂砚斋说:“作者具菩萨之心,秉刀斧之笔”^[11],这后半句是传统史官文化精神的绵延,而前半句则是传统话语包裹下的近代文明精神的表达:菩萨心者,同情弱者与不幸者之悲天悯人情怀也。假如《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不具“菩萨之心”,没有艺术虚构,缺乏悲天悯人之情怀,则《红楼梦》仅是曹家的家族衰落史而已,断然不可能像今天人们所看到的这样蕴含深广,成为中国古典小说中罕见的一部体现了“人类向绝对自由的奋斗”真正的悲剧杰作^[12]。

四

一位美国文学理论家曾说:

文学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下面三方面的问题:作家的社会学、作品本身的社会内容以及文学对社会的影响。^[13]

在笔者看来,文学研究不一定涉及作品的社会内容和社会背景,比如作者家世生平某些考证文章,作品的版本及源流演变,文字方面的校勘,就与社会距离较远甚或基本没有关系。但是,在对一部小说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时,研究者的确不可能摆脱上述的“三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本世纪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有很好的范例和传统——那就是鲁迅通过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垂范的道路。在20世纪两个对古代小说研究影响最著的人物中间,笔者个人的趣味,是更心仪于鲁迅而不是胡适。胡适的研究自然也包括了思想观念革新的意义,但相形之下,还是鲁迅的研究更有助于我们认识小

说作品的内涵与价值。胡适的研究也许可以让读者更清楚地知道作品与作者的真实情况，鲁迅的研究则使我们感觉到作品不仅是文学史上的“一个独自存在的完备的整体”^[14]，而且是透视当时社会的一个窗口，读者不仅要从小说里读到故事，观察人性，欣赏作者艺术表现的成就，而且还要从中体察社会的心理、思想和生活的变迁。从鲁迅研究的角度，我们可以把小说比作一块历史文化的化石，而不只是一个艺术品。研究者的工作就是对这种“化石”进行深入细致、发掘剖析的考察，把其中凝聚的内涵尽可能地揭示出来。

应该说，由中国古代小说体现的是一个有别于其他著述记载的“小说中国”。“小说中国”在本世纪虽然已经过几辈学人的辛勤挖掘，已呈现出相当清晰的轮廓，可供读者去游览认识，但也还是存在大量的奥秘，需要做进一步的开掘。本书就是笔者几年来对“小说中国”所做的一点开掘。这种开掘显然还很不够。笔者个人的愿望，也是希望今后能有更好的研究成果。

笔者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曾参考了前辈学者和当代学者的很多研究成果，很受启发——从本质上讲，任何学术研究都是一条长河中的一滴水，必定受惠于前人及同辈，它才能溶入其间，具有河流的气势。在本书杀青之前，笔者对所有参考著述的作者谨表衷心的感谢。同时，还特别要感谢清华大学的部分学生，在本书初稿作为“中国古代小说鉴赏与研究”课程讲义讲授时，他们作为此课的听众经常报以热烈的掌声——那些掌声在自然界里早已消失，在笔者的心里却长久留存，鼓励笔者对本书不断进行修改，只可惜最终还是未能如意。

注释：

- [1] 张爱玲《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引美籍学者陈世骧教授语。张爱玲本人也认为，就“传统的诗与小说”而言，此语“大概没有疑义”。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341页，安徽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2] 19世纪末20世纪初,小说曾被部分学者视为最具社会影响力、在普通民众中最受欢迎的文学品种,康有为《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诗中即称:“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见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剧研究卷》56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严复、夏曾佑也认为:“小说入世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见《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引自《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剧研究卷》12页;梁启超则断言小说为“国民之魂”,见《译印政治小说序》,引自《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剧卷》14页。晚近学者每每联系康、梁诸人的政治动机来诠释他们的上述看法,认为这些话主要是为了配合他们的政治目的而发的夸张之论。其实,就小说在中国社会影响的深广而言,应该说他们的见解的确是切中肯綮的。小说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一般民众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无疑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笔者手头正好有一份从Yahoo网上下载的新闻,稿件来源于台湾记者1999年8月6日发自巴拿马的专电,其中称“具有一百三十年历史的巴拿马人和会馆本月五日上午庆祝关帝公宝诞”,“在会馆举行了拜祭关帝公庆典”,“人和会关帝公的香炉从光绪三年启用到今,香火从未间断,关公的忠义庇护到巴拿马侨社”,其会馆主席称:“人和会一百多年来在关帝公的庇护下,会员心灵平和,讲究忠信,这是人和会一百多年来能薪火相传,至今屹立不摇的主因。”据称“人和会”是巴拿马“历史最悠久的侨团”,“以广东花县、中山、鹤山等地的客家人为主,约有十万会员,在巴拿马侨社中财力最雄厚”。晚清时,关帝庙曾遍及国内,经过近百年的风云变幻,多已毁坏,其遗址已难寻觅,但祭拜关帝的遗风至今在港澳及东南亚一带仍随处可见。这是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明清通俗小说在俗文化中的渗透是如何持久深入,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在民间被奉为偶像,并在华人社会中发挥了某种与宗教相类似的作用。

[3] 参看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十一章,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

[4] 有关胡适曹雪芹生平家世考证研究对现代古典小说研究方法上的影响,可参看顾颉刚《红楼梦辨序》、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的《近代红学发展与红学革命》,冯其庸《曹学叙论》第四章。

- [5] 见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季刊》第二本第二分，1930年8月。
- [6] 参看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第一章第一节：“一个曾多少接触过西方小说的研究中国传统长篇小说的研究者，迟早一定会为这样一种鲜明的对照所震惊：一方面，这类小说的大多数作品质量平平，读来无所受益；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作品，虽与上述作品出自同一文学传统，确颇具堪为补偿的长处，足以吸引老成睿智的学者。”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另见张爱玲《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旧小说好的不多，就是几个长篇小说。”
- [7] 张爱玲《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341页，安徽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 [8] 见陈寅恪《韩愈与唐代小说》，《国文月刊》57期，1947年7月。
- [9] 见王国维《宋元戏剧史》第三章，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
- [10] 参看赵冈、陈钟毅《红楼梦新探》第三章第一节，134~179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 [11] 见脂批《石头记》第五回、第九回，引自《红楼梦新探》第三章第一节，136页。
- [12] 见陈铨《中德文学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13] 雷·韦勒克(Rene Wellek)《文学论》，引自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第一章第五节，118页，香港：中华书局，1999。
- [14] 见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引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